

# 關於「河濱遺範」

謝明良

如果有心探窺中國陶瓷史的底蘊，那麼首先應該留意的或許就是「河濱遺範」的來龍去脈了，說它是進入中國陶瓷史深層結構的通關密語也不為過。



## 舜陶河濱

「河濱遺範」是緬懷聖人虞舜在河濱成功地燒造出無瑕陶器的故事，其典出《史記·五帝本記》：「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苦窳意謂粗劣、瑕疵，然而舜之可以製成無苦窳陶器的原因，是在於他以謙讓無私之德圖利百姓，無瑕的陶器於是誕生在秉持著至德的聖人虞舜之手；借用南宋至元蔣祈《陶記》的話，即是「河濱之陶，昔人為聖德所感，故器不苦窳」。完美陶器的製成因此和德產生連結，彼此緊密依存。

在中國歷史上，「河濱遺範」並非只是遙想昔時聖人德行的空泛典故，而是往往被統治者做為一種符瑞徵兆進行操作，甚至將之和天命連結，成為帝王治國的合理根基。就像歷史上許多地方官樂意地向朝廷呈報各種天人感應的吉象徵兆，並且總會博得帝王的歡心般，由柳宗元（773-819）寫就的《代人進甕器狀》頗耐人尋味。茲抄錄如下：「甕器若干事，右件甕器等，並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稱土銅之德。器慙瑚璉，貢異罍丹，既尚質而為先，亦當無用而有用，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柳宗元在德宗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駕崩、順宗即位時被拔擢為禮部員外郎，同年八月卻隨著順宗讓位憲宗而被貶外放，在赴任邵州刺史途中再次被貶往湖南南方偏地永州零陵郡任司馬，元和十年（815）更被流謫到更南的蠻荒地廣西柳州任刺史，元和十四年（819）病死任上，享年四十七歲。小林太市郎指出該瓷器狀應成於其赴柳州就任之前，職司永州司馬期間（805-815），進

而主張瓷器狀所提及的進貢瓷器乃是湖南永州零陵郡燒造之尚待考古證實的所謂永州窯；<sup>1</sup> 傅振倫則認為上引瓷器狀是元和八年（813）為饒州刺史元洪所作；<sup>2</sup> 而刊刻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朱琰《陶說》則考證其是河南道歲進瓷器。<sup>3</sup> 不過，本文在意的其實是進瓷器狀「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土銅之德」等文句，以及柳宗元被貶的際遇和他稍予至友劉禹錫（772-842）信札所透露出自身或將命喪蠻荒的無奈和恐懼。也就是說，柳宗元似乎是有意識地操作陶河濱的古典，將地方陶瓷的精緻完成度等同帝王德行的反映，並以此對當朝天子歌功頌德，冀盼浩蕩的皇恩來紓解自身的困境？

## 窯神德應侯

燒陶和德的連結，也反映在民間的窯神傳說。中國的窯神不定於一尊，有以「雷工器」聞名的雷祥（陝西地區），燒成「青龍缸」的火神童賓（景德鎮），襄助越王句踐復國有陶朱公之稱越國大夫范蠡（宜興窯），以及流行於北方地區複數窯場被敕封為「德應侯」的長壽老翁柏林（也稱伯林、柏靈、柏翁）。晉身窯神的條件不一，有的是技藝精湛而不藏私，也有因襄助家國有成卻不居功者，甚至包括憐憫同役之苦而以骨作薪，捨身躍入窯火的悲壯英雄，但其共通的特質不外乎是有著高尚的情操且能造福人民，如果借用《管子》解舜陶河濱的說法，即「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也」。（卷21，〈版法解〉）

從現存的資料看來，傳晉永和年間（345-356）遊覽至北地，傳授時人「火窯甄陶之術」的伯林，很值得留意。立於北宋元豐七

年（1084）的《德應侯碑》（陝西耀州窯）碑文載耀州太守奏請朝廷封山神、土神為德應侯，立廟設祠，廟中立壽人柏林祠堂（圖1）；<sup>4</sup>明代弘治三年（1490）《重修伯靈廟記》（山西榆次窯）也記錄當地舊有神祠「世祭伯靈仙公，或者以為上古始為陶□之人」，又提到聖人虞舜「嘗陶於河濱，當時器不若窳，無非盛德所致也」，<sup>5</sup>將伯靈的功業與上古舜陶河濱的故事相提並論，河北臨城東磁窯溝的窯神廟甚至被稱為「堯舜廟」。<sup>6</sup>至如乾隆三十七年重修《柏林礪》碑（河南湯陰鶴壁集窯）也載柏靈為「我湯邑尊也，後封為德應侯」。<sup>7</sup>

從成書於西元前一世紀《史記》舜「陶河濱」的記事，迄清末咸豐二年（1852）重修窯神廟（陝西耀州窯）碑文所見「昔舜陶於河濱」，近兩千年間，秉持至德聖人燒陶之「河濱遺範」典故，以其強韌的生命力存活在陶瓷的世界中。事實上，中國史上也不乏暗自廁身於至德聖人行列，自許或者操弄當朝無苦窳陶瓷的帝王。明白此點，我們才能更為周全地評估地方貢瓷，或帝王賞賜瓷背後的意涵，至於官窯制度的成立也應在此脈絡中予以掌握。

## 德與天命

窯神廟碑除了提及舜陶河濱器不苦窳，也引用了《周禮·考工記》「髻墾薛暴不入於市」的訓誡，<sup>8</sup>髻為變形，墾是損傷，薛指裂璽，暴為債起或剝落，亦即損傷有瑕的陶瓷不能販售市肆。收錄於《文苑英華》的一則中晚唐期《對陶人判一市稱陶旒者髻墾薛暴》載：「惟彼陶者，為藝之卑，讀遠古之書，豈功埏埴，異河濱之跡」，說的是市肆販瓷



圖1 北宋 陝西省耀州窯 《德應侯碑》拓本 元豐七年（1084）立 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輯，《陝西銅川耀州窯》，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圖版參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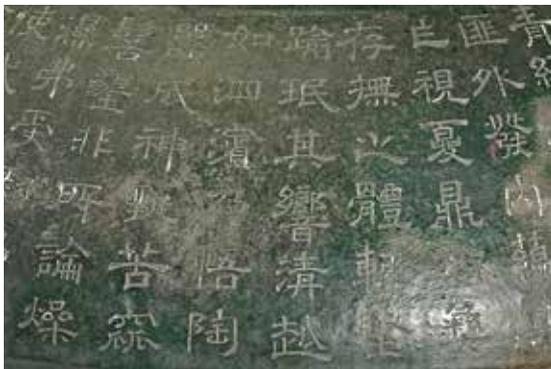
者以髻墾薛暴等瑕疵品冒充完器出售，是異於舜陶河濱的敗德行為。<sup>9</sup>此一情事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陶瓷史官窯遺址瑕疵品處理方式及其意涵。如明代景德鎮珠山御窯廠遺址就曾發現刻意毀損瑕疵製品並集中掩埋的坑窖，其唯恐髻墾薛暴陶瓷外流的防範措施，既說明了由帝王所壟斷的官窯製品具有等級的象徵意涵，不容僭越，同時也需杜絕瑕疵成品在民間流通交易以免招致敗德之譏。相對而言，自信本朝陶瓷精絕的清乾隆皇帝則樂意



圖2 東漢（1~3世紀） 綠釉陶壺 高38.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轄下陶瓷外輸，如他予英國王的著名敕諭就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綢，為西洋各國所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霑餘潤」，<sup>10</sup>對於乾隆皇帝而言，陶瓷外銷也是他德政的一環，自以為是舜陶河濱「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的承繼者。

乾隆皇帝對於陶冶不遺餘力，既責成內務府員外郎唐英編明《陶冶圖》，也令臣下編繪《燔功彰色》、《埏埴流光》等陶瓷譜冊，<sup>11</sup>大力宣揚舜陶河濱的典故，從多方面著手進行操作。他有多首與河濱遺範相關的詠瓷詩，並且往往將詩文鐫刻在清宮藏古陶瓷之上，如乾隆十七年（1752）《古陶窯歌》：「腹脩口奔德能畜（中略）陶於河濱此其躅」；乾隆二十四年（1759）《陶尊》「其響清越如泗濱，乃悟陶器成神甄，苦窳髻壑非所論」（圖2）；乾隆三十八年（1773）《詠古陶



〈綠釉陶壺〉局部

罐》：「陶出河濱臥繭成」；乾隆五十七年（1792）《題陶器弦文壺》：「陶則始虞此器留」，成詩年代自其壯年期以迄古稀之年，應該可以說是乾隆皇帝終其一生念茲在茲、樂此不疲的課題，甚至將清宮收藏的宋盜刻上「比德」（乾隆四十四年，1779）、「德充符」（乾隆三十八年）等字銘。「德充符」典出《莊子》，充指充實，符為驗證，即對德的充實與證驗。毫無疑問，乾隆皇帝乃是以至德的聖王自居。在中國史上自我感覺良好，以聖王自居的帝王當然不止於乾隆皇帝一人，但乾隆皇帝對此斧鑿至深，顯得極為突出，就如西周史官記載周文王治國有方，懿德讓他得以持擁天地，合受萬邦。<sup>12</sup>清初皇帝特別是乾隆皇帝顯然對此一德與天命的古典了然於心，故而不時強調其自身正是因稟賦了至德而承受天命統治中國，<sup>13</sup>做為滿州人的乾隆皇帝就是借由舜陶河濱的故事來宣示其統治漢人的合理性。

### 宋瓷「河濱遺範」銘記

南宋咸淳己巳（1269）茅一相（審安老人）撰《茶具圖贊》列舉了茶道相關道具，並以擬人化的手法賦予茶具姓名字號或官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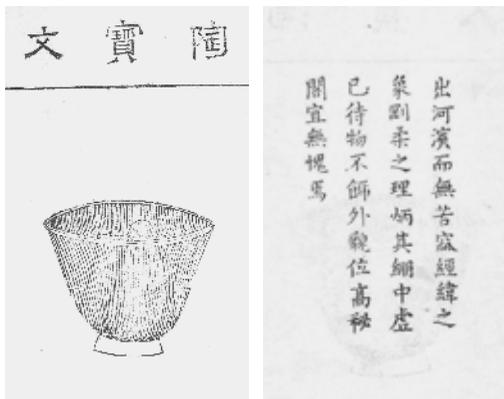


圖3 南宋 審安老人撰《茶具圖贊》「陶寶文」及圖贊  
取自(宋)審安老人，《茶具圖贊》(外三種)，杭州  
市：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頁22-23。

其中，表現茶盞盞壁內外滿布縱向細密條紋的點茶用兔毫盞「陶寶文」，被繫以贊曰：「出河濱而無苦窳」，故入藏皇家秘閣，當之無愧。(圖3)瀰漫著復古、慕古風潮的宋代，朝廷上下既熱衷追尋三代古物，也致力於器物銘文的釋讀和考證，「陶寶文」(兔毫盞)雖只是當時流行的點茶道具，也被賦予了古典贊詞。

舜陶河濱的古典在宋瓷當中屢見不鮮，如現藏日本的一件北宋至金磁州窯白釉珍珠地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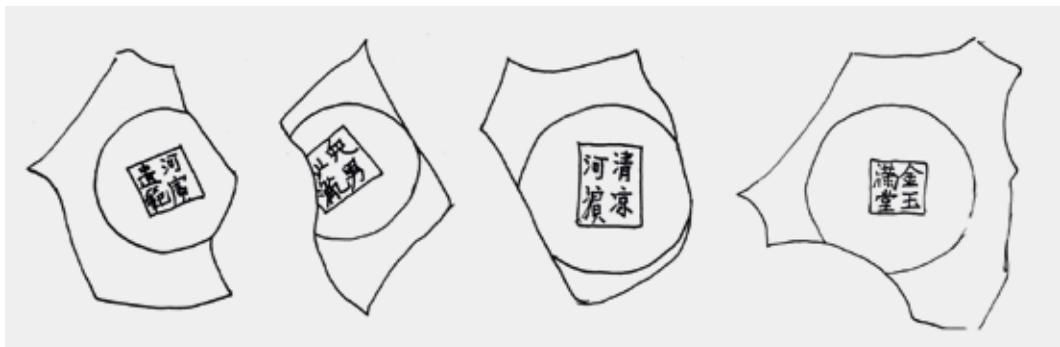


圖4 鈐印「河濱遺範」、「清涼河濱」、「金玉滿堂」字銘的青瓷標本線繪圖 浙江省麗水市縉雲縣大溪窯窯址出土 取自黃彩紅等，〈縉雲大溪灘窯址群地面調查簡報〉，《東方博物》，2009年33輯，頁88，圖14。



圖5 「河濱」字銘青瓷標本 寬10公分 浙江省龍泉窯大窯採集  
取自項宏金編著，《龍泉青瓷裝飾紋樣》，杭州市：西泠印  
社，2014，頁137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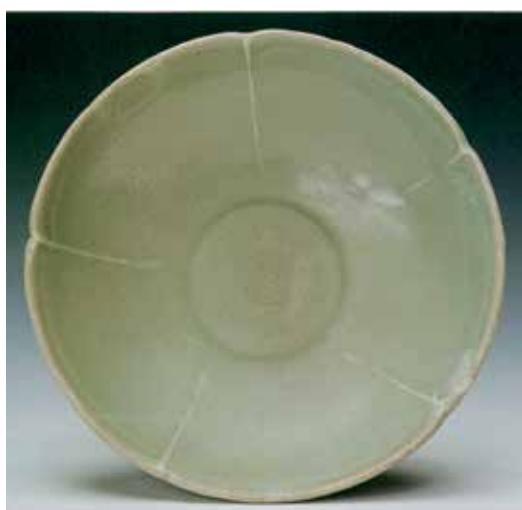


圖6 南宋(12世紀)「河濱遺範」印銘龍泉窯青瓷五花口碗  
寬12.4公分 浙江省博物館藏 取自朱伯謙主編，《龍泉窯  
青瓷》，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頁126，圖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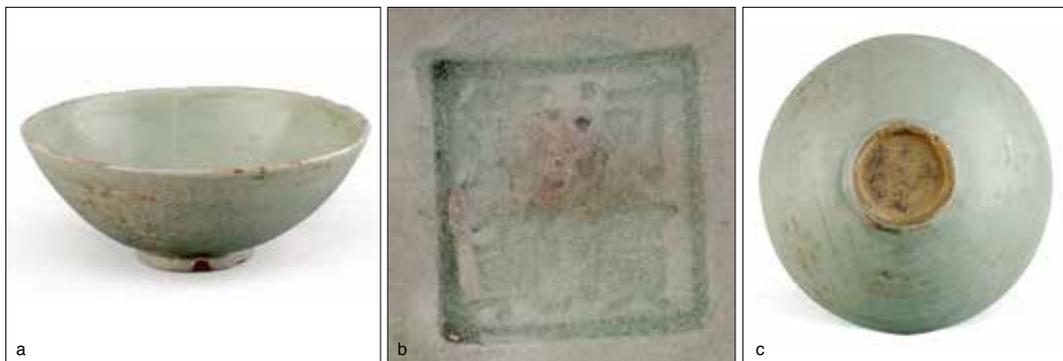


圖8 南宋（12世紀）龍泉窯五花口青瓷碗 帶「庚戌年」墨書的「河濱遺範」印銘 a.正面 b.內底「河濱遺範」印銘 c.外底 高6.2公分 安徽省績溪縣宋墓出土 取自浙江省博物館，《青色流年——全國出土浙江紀年瓷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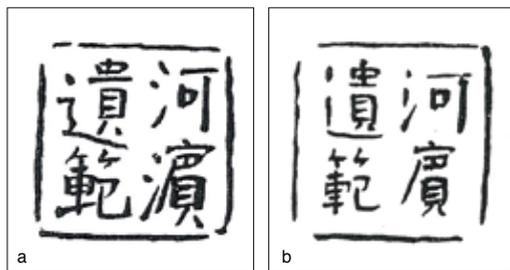


圖7 松村雄藏摹「河濱遺範」 a.浙江省龍泉窯大窯採集； b.浙江省龍泉窯金村窯採集 取自松村雄藏，《龍泉青瓷の銘款》，《陶磁》，7卷5號（1935），頁8右行3；頁9右行上。

丹紋枕背底澀胎處有「舜陶佳皿」墨書；<sup>14</sup> 浙江省麗水市縉雲縣大溪窯窯址出土了在內底捺印「清涼河濱」字銘的宋元時期青釉碗（圖4）；浙江省龍泉窯大窯也曾採集「河濱」印銘標本。（圖5）不過，最為常見的無疑要屬在碗內心處押印「河濱遺範」字銘的龍泉窯青瓷碗，後者帶單方框，口沿呈五花式，花口下方飾白泥堆線。（圖6）

「河濱遺範」印銘是龍泉窯屢見不鮮的銘記。早在1930年代陳萬里已在龍泉窯的大窯和金村採集到「河濱」（篆體）、「河濱遺範」（正體）等帶字殘片，<sup>15</sup> 松村雄藏也對此類印銘做了摹寫。（圖7）儘管英國大維德爵士藏之清宮舊藏龍泉窯「河濱遺範」銘青

瓷碗曾被視為南宋修內司官窯，其年代亦有爭議，除了南宋說之外，亦見北宋或元代等不同說法，<sup>16</sup> 但今日已可確認其應屬南宋期製品，至於是出自南宋那一時段則又和安徽省宋墓出土「河濱遺範」碗外底墨書「庚戌年元美宅立」之「庚戌年」的年代比定問題有關。（圖8）如1960年代《龍泉青瓷》以「庚戌」年為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1980年代任世龍和朱伯謙認為「庚戌」是南宋紹熙元年（1190）。<sup>17</sup> 1990年代龜井明德則是參酌日本遺址標本主張龍泉窯東區出土此類青瓷碗的相對年代應在十二世紀後半（第3四半期末～第4四半期），<sup>18</sup> 本文從之。

然而我們也需留意，目前可確認的龍泉窯「河濱遺範」碗之口沿多呈五花式，而五花式碗則是中國晚唐至北宋早期流行的碗式，龍泉窯之外不少瓷窯到了南宋時期基本已為六花式口碗所取代。換言之，相對於其他瓷窯，呈五花口的南宋龍泉窯「河濱遺範」印銘青瓷碗，可說是仍然保留著晚唐、五代迄北宋早期樣式的古典碗式。尤應留意的是，浙江省新昌縣南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墓也出土了龍泉窯五花式口青瓷碗，<sup>19</sup> 設若後者並非一度傳世後再入壙的古物，則可再次



圖9 唐代（9世紀）越窯秘色瓷碗 高9.4公分 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 取自文物出版社編，《佛門秘寶大唐遺珍——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臺北：光復書局，1994，圖78。



圖10 南宋（12世紀）「河濱遺範」印銘龍泉窯五花口青瓷碗 寬約13.7公分 韓半島開城出土 取自奧平武彥，《朝鮮出土の支那陶磁器雜見》，《陶磁》，9卷2號（1937），圖5A。



圖11 南宋「河濱遺範」印銘青瓷破片 寬 13.8公分 韓國濟州市新昌海底打撈品 取自國立濟州博物館編，《國立濟州博物館》，首爾特別市：國立濟州博物館，2013，圖115。

實證南宋龍泉窯陶工選擇了不逢迎時尚趣味的頑強保守性格，而此一古典五花碗式及花口下方的白泥堆線飾則又和唐咸通十五年（874），供奉捨入陝西省法門寺的越窯秘色瓷的外觀有共通之處（圖9），至於相對年代約在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期的著名梅子青釉「馬鐙絆」青瓷碗碗口則呈六花式。另外，從南宋龍泉窯同式碗碗心亦見「金玉滿堂」等印銘，可知龍泉窯「河濱遺範」銘記已然是流行的吉祥語句了。

### 「河濱支流」

龍泉窯「河濱遺範」銘青瓷碗也隨著宋

代陶瓷的外銷而被販售到東北亞韓半島和日本等地。如1930年代韓半島開城地區墓葬曾發現此類青瓷碗，其口沿呈五花式，花口下方碗內壁飾白泥堆線，碗心模印「河濱遺範」方框字銘（圖10），整體外觀酷似前引中國出土例。（見圖8）相對於上述開城古墓所見釉質精良的五花式口碗，近年韓國濟州市新昌海底則又打撈出同屬南宋龍泉窯「河濱遺範」印銘釉色偏黃的粗質青瓷碗底殘件（圖11），發現地點正位置於當時連接中國和日本的航路上。

日本九州博多遺跡或鎌倉海岸亦見出土或採集例。其中博多區祇園町曾出土內底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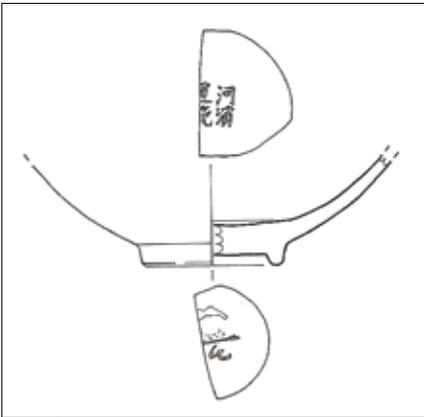


圖12 「河濱遺範」青瓷碗線繪圖 日本九州博多區祇園町出土 取自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等，《博多遺跡群第3次調査—萬行寺納骨塔建設にともなう發掘調査—》，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報告第515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等，1997，頁10，圖8之00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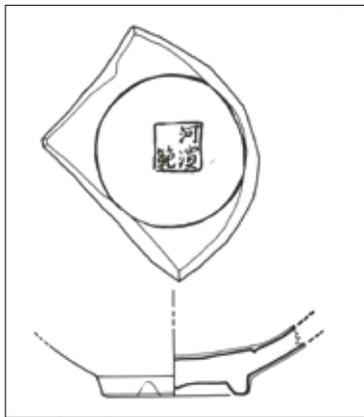


圖13 「河濱口範」青瓷碗線繪圖 日本九州大宰府觀世音寺東南部出土 取自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蹟》平成元年度發掘調査概報，大宰府市：九州歷史資料館，1990，頁32，圖21之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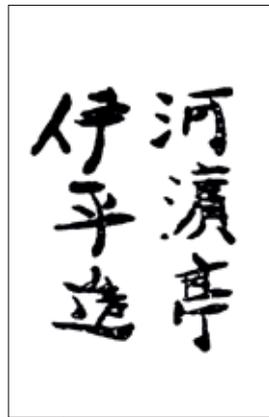


圖14 九州肥前陶工平林伊平「河濱亭 伊平造」摹本 取自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熊本市：青潮社，1985年版，附圖及頁573的說明。

印「河濱遺範」字銘的青瓷碗標本，其外底另有字跡滲漫無法辨識的墨書。（圖12）其次，在調查九州大宰府觀世音寺東南部地區時也出土了內底鐫印「河濱口範」銘的南宋龍泉窯青瓷碗底殘件。（圖13）

目前並無資料顯示韓半島高麗朝或日本鎌倉時代的消費者欽慕舜陶河濱的典故，遑論經由「河濱遺範」字銘而產生其與中國古代聖哲的連結。看來包括中國南宋時期在內的絕大多數消費者只是將此一銘識視為一種雅緻的吉祥詞語或作坊標幟罷了。不過，此一情事到了韓半島朝鮮時代或日本江戶時期出現了轉折。如朝鮮實學北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與中國學者書信往來頻仍的朴齊家（1750-1805）之《北學議》就提到「舜陶河濱，器不苦窳，三代之器，逾古逾巧」，並且批評其時韓半島市肆所羅列的壺鐘碗罐等陶器品質低下，器底粘結砂渣，進而發出「若在三代之時，皆不得驚之列者也」的慨嘆，而此一感嘆無疑是承襲本文前已多次援引之《周禮·考工記》「鬻壺薛暴不入於市」的訓誡。

江戶末期迄明治初期九州肥前地區陶工平林伊平（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歿），則是將自家的陶瓷生產與舜陶河濱的典故進行連結，以「河濱亭 伊平造」做為陶瓷的印記。（圖14）但在日本陶瓷史上大肆宣揚河濱遺範典故者，無疑要屬京都著名的永樂一門陶工了。

永樂一門是世代居住京都的製陶家族，原姓西村，後改姓永樂。初代宗禪曾為佗茶師匠武野紹鷗（1502-1555）製作陶風爐，迄三代宗全更與千利休家建立緊密的連繫，成為千家十職之一的土風爐師（陶工），至今已傳十七代。其中，第十一代保全是第十代了全的養子，保全一生作品可分為善五郎時期（1817-1843）、善一郎時期（1843-1847）和保全時期（1847-1854）等三個期別。善五郎時期作品可見在作品捺印「永樂」或「河濱支流」印銘。（圖15）「河濱支流」印是紀州藩藩主德川治寶於和歌山營建別墅西濱御殿偕樂園，於文政十年（1827）招聘保全和仁阿彌道八等陶工燒造御庭燒（偕樂園燒）



圖16 1848-1849 京都陶工保全製作 河濱燒筒式茶碗 底部碗體折腰處鈐印「河濱」 高8.4公分 取自三井記念美術館編，《永樂の陶磁器—了全、保全、和全—》，頁38，圖53。



圖15 1827-1843 京都陶工保全製作 金彩鳳凰紋寶珠形盒 外底鈐印「河濱支流」及內底 高6.2公分 三井記念美術館藏 取自三井記念美術館編，《永樂の陶磁器—了全、保全、和全—》，東京：三井記念美術館，2006，頁12，圖11。

之際，賞賜予保全的印章，因此鈐印「河濱支流」的保全製品之相對年代當在文政十年之後不久。其次，保全於嘉永元年（1848）離開京都至琵琶湖畔燒造鈐印有行書體「河濱」字銘的河濱燒。（圖16）<sup>20</sup>

實在汗顏，筆者迄今未能究明「河濱支流」印記到底是紀州藩主德川治寶被動因應保全的請求才賜下？或者根本就是藩主自身的創意？若是前者，則保全顯然當仁不讓地將自己的陶藝視為是舜陶河濱器「不苦窳」的再現之作，若屬後者，則意謂藩主德川治寶熟知中國區域帝王權術，自命是聖人虞舜的合法繼承者。無論何者，印銘所見「支流」或許並非客套，而是聲稱不苦窳之精絕作品甚至德和天命的轉移：由中國區域轉移到日本列島。只是我們也不宜過度強調「河濱支流」的政治性意涵，因為其更有可能只是頗有文人學養的永樂家陶工利用中國的古典來宣揚其精絕的陶藝，性質接近廣告用語。

永樂家第十一代陶工和全（1823-1896）是保全的長子，由其製作的金欄手赤壁賦碗，碗心有青花「永樂 精製」字銘，圈足內底



圖17 京焼陶工和全（1823-1896）製作 青花金彩赤壁賦碗 內底及外底「河濱支流」印銘 高9.2公分 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京焼—みやこの意匠と技》，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2006，頁218，圖224。



圖18 明代（17世紀）青花赤壁賦圖碗 賦文部分及內底 寬16.5公分 Rijksmuseum藏 取自Christiaan J. A. Jörg,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ondon: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1997, 42, fig. 11.

鈐印「河濱支流」單圈印記。（圖17）從碗的造型、碗外壁圖繪、赤壁賦文之書寫布局，以及碗心「永樂 精製」銘款等各方面看來，其顯然是參考了明末崇禎年間景德鎮的青花赤壁賦碗。（圖18）後者內底心有「永樂年製」青花篆款，是明末景德鎮陶工針對明初永樂朝壓手杯式的加大型做製版，日本九州長崎市唐人住居遺跡也曾發現這類由中國進口的陶瓷標本。因此，京燒陶工和全是以距他兩百多年前的明代古物為模倣的對象，但相較於明代景德鎮赤壁賦碗的大方沉穩，和全製品則在拘謹中顯得輕盈和華美，另有一番風情；而永樂保全、和全父子熱衷摹倣景德鎮嘉靖窯金襴器（見圖15）、崇禎期吳祥瑞青花瓷（圖19）以及福建漳州窯鉛釉三彩等晚明古陶瓷一事，也反映了日本文政年

（1818-1830）以來再次勃興之對於明代古物的蒐求風潮。尤應一提的是，不僅明末青花瓷可見底書「堯舜年製」作品（圖20），日本傳世的祥瑞器當中亦見「堯舜年製」銘款製品（圖21），故不排除由紀州藩主德川治寶賜予保全、和全之「河濱支流」印銘是受到此類明末陶瓷銘識的啟發。

### 結語

在中國古代，既曾將無瑕陶器的製成歸功於至德聖人，而製作陶器的陶鈞（轆轤）有時也被賦予了實際功能之外的其他意涵。

中國大約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出現了用來修整陶器的慢輪，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如龍山文化陶器就已採用快輪拉坯成形。就是因為以陶鈞拉坯，製器



圖19 嘉永五年（1852）京都陶工保全製作 做祥瑞青花筒形水指 高19.5公分 外底書「准矣祥瑞圖蹟 製高規虞上丸爐 河濱支流永樂」 取自三井記念美術館編，《永樂の陶磁器—了全、保全、和全—》，頁28，圖35。



圖20 明代（17世紀）「堯舜年製」銘青花瓷盤 日本私人藏 取自齋藤菊太郎，《陶磁大系・44・古染付「祥瑞」》，東京：平凡社，1972，頁91。



圖21 明代（17世紀）古祥瑞「堯舜年製」銘建水日本私人藏 取自滿岡忠成編，《祥瑞》，芦屋：滴翠美術館，1968，頁28，圖4、5。

者可隨心所欲決定器之大小高矮，所以也是王者治理天下之喻，如《史記·鄒陽傳》：「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集解》：「漢書音義曰，陶家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把家國萬

物視為一個大的轆轤（大鈞）。顏師古注《漢書·鄒陽傳》說得更為具體：「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者轉鈞」，而原指陶人作陶的「陶甄」，也成了聖王治理天下之喻，如《晉書·樂志》：

「弘濟王憂，陶甄萬方。」前已提及，對舜陶河濱之德與天命象徵意涵運作至深的乾隆皇帝，也把陶鈞視為他所統領的天下。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御製《詠龍泉盤子》提到由侍衛哈青阿進呈的該宋代龍泉窯盤乃是發掘出土自吐魯番，因此「今遠人內面，入我陶鈞，襲而藏之，用示柔遠」，真的是全身充滿政治細胞的帝王。

文末，應該申明的是，龍泉窯「河濱遺範」印銘青瓷的品質檔次不一，精良者口沿切成五花口，花口下飾白泥堆線，其年代約在十二世紀後期，粗製者因筆者所見限於碗底殘片，故其口沿是否呈花口？而除了南宋製品之外，部分標本是否可能稍晚？此均有待日後的追蹤。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 註釋

- 小林太市郎，《東洋陶磁鑑賞錄》中國篇（京都：便利堂，1950），頁136-138。
- 傅振倫，〈柳宗元贊美饒州瓷器〉，《河北陶瓷》，1991年3期，頁48。
- （清）朱琰，《陶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版，1956），頁53-54。另，尾崎洵盛，《陶說注解》（東京：雄山閣，1981），則列舉《新唐書·地理志》貢瓷還包括河北道邢州鉅鹿郡、江南道越州，指摘朱說有誤（頁444）。
- 陳萬里，〈我對於耀瓷的基本認識〉，《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4期，頁74；商劍青，〈耀窯摭遺〉，《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4期，頁75-78；傅振倫，〈跋宋德應侯廟碑記兩通〉，原載《文獻》，15輯（1983），收入同氏《中國古陶瓷論叢》（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頁165-168；李毅華等，〈窯神碑記綜考〉，《中國古陶瓷研究》創刊號（1987），頁46-70轉頁43。
- 李毅華等，前引〈窯神碑記綜考〉，頁60-61。
- 傅振倫，前引〈跋宋德應侯廟碑記兩通〉，頁165。
- 陳萬里，〈鶴壁集印象〉，《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10期，頁57。
- 李毅華等，前引〈窯神碑記綜考〉，頁52-53所輯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重修窯神廟碑記》。
-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530。另見：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原載《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2003冬），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2007），頁260。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96）頁57所收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為請于浙江等口通商貿易斷不可行事給英國王的敕諭〉。
- 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2卷2期（2004冬），頁133-166。
- 見西周前期「史牆盤」銘文，詳參見：小南一郎，〈天命と徳〉，《京都》《東方學報》，第64冊（1992），頁38，以及同氏《古代中國 天命と青銅器》（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6），頁192。
- 如清太祖努爾哈赤（1559-1626）在1616年宣布建立後金王朝就以天命為年號（1616-1626），與明朝競逐天命歸屬，在此之前1612年至1615年之間多次出現的夜空虹光（北極光）也被操作成是天命即將轉移的預兆，此參見：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頁49。
- 齋藤菊太郎，〈陶磁大系·44·古染付 祥瑞〉（東京：平凡社，1972），頁110，圖42。
- 陳萬里，《瓷器與浙江》（北京：中華書局，1946，香港神州圖書公司再版），頁54-55。
- 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磁考（二）〉，收入《陶器講座》第參卷（東京：雄山閣，1935），頁59依據中尾萬三曾在萬松嶺採集得到此類「河濱遺範」銘標本等線索而主張大衛德藏品或屬修內司官窯。另外，北宋說見：馮先銘，〈宋代瓷器發展的幾個問題〉，收入《馮先銘古陶瓷論文集》（香港：紫禁城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7），頁287；元代說見：Margaret Medley, *Yüan Porcelain & Stonewa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4), 67.
- 浙江省輕工業廳等編，《龍泉青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66），頁124，圖9說明；任世龍，〈龍泉青瓷的類型與分期〉，《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19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122-123；朱伯謙，〈龍泉窯的起源と早期の製品の特徴〉，《出光美術館館報》，39號（1982），頁47。
- 龜井明德，〈草創期龍泉窯青磁の映像〉，《東洋陶磁》，19號（1989-92），頁15。
- 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圖206。
- 永樂家陶工作品和生平參見：河原正彥，〈江戸後半期の京焼作家—仁阿彌、保全、龜祐など—〉，收入《世界陶磁全集·6》（東京：小學館，1975），頁269-271；特別是參照了清水實，〈三井家傳來 永樂の陶磁器—了全、保全、和全—〉，收入：三井記念美術館，《永樂の陶磁器—了全、保全、和全—》（東京：三井記念美術館，2006），頁100-111的分期方案和論考。